

《情满九道弯》在央视和优酷热播,再次确证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秘辛 在一代代人奋斗曲线里感受时代脉搏

■本报记者 王彦

考大学和出门闯荡,哪个才是人生更优解?今天的年轻人会调用自己的见识来证明奋进的时代容得下不同选项。但若时光倒退40多年呢?那一代人的奋斗路径并多少可参考的答案之书,历史烙印、社会变革、时代发展甚至人情社会,个个都可能是变量。正在央视和优酷热播的《情满九道弯》就试图从年轻人的情感与奋斗故事里求解时。

该剧由刘家成导演、王之理编剧。这两位主创的名字并置,熟悉国产剧的观众第一反应便是“京味儿大戏又上新了”。新剧的故事的确以北京东城区九道湾胡同为原型,不过这一回,被誉为“京味儿剧旗手”的创作者在保留京腔京韵的同时将更多笔墨落于时代:他们从老北京的胡同出发,勾勒一群年轻人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经历人生坎坷、情感流转、事业起伏的故事,在他们质朴的生活韵律里打量时代的车辙。

如果说亲历过那个岁月的观众能从剧中瞧见跨越40年的光景,回味爆米花机里的童年香气,感慨剧中人的经历也曾是“世另我”;那么《情满九道弯》与今天的年轻观众顺利对话,得益于个体故事背后的时代之风,风里蕴藏着随时代扶摇而上的人生启示录。就像刘家成所言:“我钟爱的京味儿其实就是烟火味,是百姓生活的味道。无数平凡家庭支撑起我们的国家,我拍千家万户奋力创造美好生活的风貌,是因为国家的进步与强大就体现在这些幸福中。”

一群不完美的小人物,平添真实生活的“人气”

故事主人公杨树茂是个妥妥的正能量青年,从一名错过高考的胡同青年,经商场历练后成长为一代企业家,敢闯敢拼并最终带领街坊共同奔向致富路。《情满九道弯》也反映着如今创作的一种潮流:从主角到配角几乎没有“完人”,至少没有观众“一致喜欢”的完美人设。

返城知青杨树茂是家里的“老幺”,外号“傻茂”,一个“傻”字,既是他真性情的凸显,在有些视角也可能是“情商不在线”的外露。比如他为人热乎乎仗义,可在小到没少惹祸,每次“路见不平”都得牵累父母哥哥道歉的道歉、赔偿的赔偿。男主身边,叶菲、史小娜、赵亚静三个女孩代表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性格类型,因先后和男主发生情感交集,她们的爱情观与价值观都成了今天观众品评的对象。出身书香门第的叶菲性格沉稳,但她前期对“情敌”的迂回试探、生子后



《情满九道弯》试图从年轻人的情感与奋斗故事里求解时代。图为该剧海报。

对误会避而不谈,史小娜插队期间没少受杨树茂庇护,但当自家父亲不坦荡、不光彩地占有了杨树茂的商机,女孩在爱情与家族利益之间的倾向令网友颇有微词。赵亚静在商场上为男主角引路、与他并肩,姑娘干脆利落的个性很招人喜欢,但她对“单箭头”爱情的执迷不悔和凡事都能用利益明码标价的观念,引出观众不同看法。最让人意外的角色莫过于杨家母亲。艺术家萨日娜登场,一改往日作品里宽厚善良的中国母亲形象,既演出了“父母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的亲情之爱,更把人物眼界有局限、为人好算计的市井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谢志强、贾小樱、许大爷等角色,剧中人各有各的可爱与可叹。

乍一看,不完美的小人物扎堆,打打闹闹地根本谈不上“情满”。可人无完人,五味杂陈本就是世间生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能帮这群平凡人趟过磨难、砥砺风雨的,终究是人性在闪光。杨树茂和谢老拐他们的工程面临巨大危机时,许大爷出手,仰仗的便是人间正道。家里哥哥的生活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陷入困境时,“傻茂”施以援手,驱动他的最大力量一定是亲情。正因为这一个个平凡如你我他,对真善美向往如你我他的角色在胡同里与命运交锋,平添真实生活的“人气”,荧屏前的观众才感同身受,怀想自己磕磕碰碰度过的岁月。就像《情满九道弯》剧名的双关,“九道弯”是北京东城实实在在的一条老胡同,“九道弯”更是40年间人生的沟沟坎坎、爱情的兜兜转转、事业的

“京味文化”能常拍常新,归根结底源自真实的力量

采访中,刘家成对“京味文化”的情结贯穿始终。事实上,在《情满九道弯》之前,他创作的《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反映北京人生活的作品都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赢得观众认可。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刘家成说,京味儿其实就是百姓生活的味道。

拍发生在自己和身边人的真实事、真情感,是这位“京味儿剧旗手”的创作法则。而“京味文化”能常拍常新,乃至海派、东北、粤式等等地域流派可以穿透时空“留得住”,归根结底依然源自真实的力量。

刘家成说:“作为一部献给百姓的年代剧,大框架要立得住,细节上也不能含糊,否则就失了生活的真实。”剧中,当年生活的各种细节,从三轮运输车、推小孩的竹车、窗式空调、蜂窝煤到煤炉子上烤焦的馒头等,创作者都尽力呈现;比照胡同当年的风貌,剧组搭建了近两万平方米的实景建筑;道具用的亦是真材实料。饰演杨家父母的毕彦君、萨日娜还给剧组带来额外的触动,他们随身带着烟圈、鸟笼、老北京菜谱进剧组,富含浓郁年代感的老物件儿和两位艺术家对人物情感状态细腻的把握相辅相成,一对传统父母的爱与罚跃然荧屏。

当然,“硬件”真实之外,“软件”可信度

也会左右人们的观感。初始剧本里有个情节,杨树茂生意失败,最潦倒时哥哥凑了五万块钱给他。后经演员提议,这事儿改到了母亲身上。“儿子人生最低谷时,她不会说好听话,却能直接拿出一个旧报纸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万块钱。”一位看起来“掉钱眼里”的人物,究其内心不过是个以宽厚胸膛为子女筑后盾的母亲。

更进一步的真实,还在乎家与国。刘家成的作品序列里,《情满四合院》傻柱的路之所以越走越宽,《正阳门下小女人》徐慧真的小店之所以有声有色,《情满九道弯》杨家的生活之所以越来越有奔头,都因为好日子是从烟火中熏出来的。创作者说:“无数平凡家庭支撑起我们的国家,我拍千家万户的幸福,是因为国家的进步与强大,就体现在这些幸福中。”

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蕴藏在时代发展的每一页中

《情满九道弯》的开篇镜头,村口大喇叭的广播将人们思绪拉回到1979年初:知青返城,改革开放拉开大幕。以杨树茂他们为代表的北京青年就要回到胡同,参加高考、进工厂端“铁饭碗”,去南方经商,不同的道路铺展在年轻人面前。20集过后,风云流转,时代进入了“南巡讲话”后的日子,更深刻的变革和更深入的现代化建设已启航。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张国涛从近年来一批现实题材佳作中提取到了“时代”这一公因数,即“以小人物凸显大时代,也让时代之光照进普通人的生活”。以登陆优酷平台的现实题材剧为例,去年的爆款剧《幸福到万家》里,“敢姐”何幸福追求勤劳致富、公平公正,带领全村奔向幸福生活;《请叫我总监》里,秘书宁檬坚韧又独立,从小角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投资人,让人刮目相看;《我们这十年》更是把不同领域、不同地方的年轻奋斗者群像推送到观众面前,每个单元都能激荡剧里剧外的同频共振;还有反映公检法战线守护公平正义的《风雨送春归》《冰雨火》《庭外》等作品,所有这些现实题材剧能引发共鸣、激励人心,因为剧中反映的质朴生活和世事变迁里,时代的高度耀目可见。2023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5周年的纪念,聚焦中医传承的《后浪》、丁黑导演新作《鸣龙少年》等众多现实题材大剧也将先后上线。同时,刘家成与优酷合作打造的“情满”系列剧最新篇《情满盛街》也已进入了筹备期。

一直以来,“时代说书人”是观众赠予中国电视剧的美誉,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影视创作的重要财富。身处大时代,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蕴藏在时代发展的每一页中。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和终究被回避的“疾病”

■本报记者 柳青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上周五上映,虽有休·杰克曼主演,影片的首周末不到70万元的低迷票房着实令人扼腕。2021年夏天,同是佛罗赖恩·泽勒自编自导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在内地上映,最终票房超过3000万元,是全国艺联发行文艺片的最好成绩。“父”与“子”之间,为何落差这样大?

法国作家佛罗赖恩·泽勒的剧作《儿子》,和他之前的《父亲》《母亲》组成当代欧洲戏剧文学中声誉很高的三部曲。这个“家庭序列”的特殊之处在于主角都是在世俗看来“病态”的人物,《父亲》是丧失了时间概念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母亲》无力摆脱更早期的无因的愤怒,《儿子》是被抑郁症吞噬的少年。在这三部剧作中,泽勒利用疾病的隐喻,探讨非常态的生命体验,用戏剧的方式呈现讳莫如深的“病患的内心痕迹”,从中叩问生命哲学与人的存在本质——理性究竟是生命的秩序,还是生命的枷锁?

2019年,话剧《儿子》在伦敦公演时,掀起的情感回应是惊人的,这个剧本和当时的演出是难得直观地在文艺作品中正面呈现青少年抑郁所具有的毁灭性的能量,这种黑暗的、无理性的能量,既摧毁了个体,也瓦解了家庭。继把《父亲》拍成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泽勒再一次亲自执导了他的剧本,把《儿子》拍成《困在心绪里的儿子》。《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利用非线性剪辑,影片以角色错乱的意识流动取代了严谨的线性叙事逻辑,这放大了原作伤感的内核:父亲失去了清晰的时空意识,沉沦在记忆的迷宫里。《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仍然可以被视作一部让人心碎的家庭伦理片,扮演父亲的休·杰克曼和扮演母亲的劳拉·邓恩交付了摧心剖肝的表演,成熟的名演员的光环是无法忽视的,这也使得剧作从舞台向银幕转码的过程中,重心从孩子转向了父母,回避了“疾病不可控不可愈”的残忍认知,避重就轻于未亡人的自我和解。事实上遮蔽了原作尖锐的锋芒。

从《父亲》到《儿子》,亲人的困境、亲密关系里的爱与折磨,都是不可回避的,但剧作的本质是围绕着“迷失的病人”,阿尔兹海默症的老父失去了时间的秩序,抑郁症的儿子失去了心理的秩序。对困在心绪里的少年尼可拉斯而言,他最深的痛苦是他无法描



继把《父亲》拍成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法国作家佛罗赖恩·泽勒再一次亲自执导了他的剧作,把《儿子》拍成《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上周五在内地上映,首周末票房不到70万元。图为影片海报。

述自己的痛苦,他混乱的意识就像翻滚的洗衣机滚筒,乱作一团,无法平息。他既不能管理内心秩序,也没有办法按部就班地恪守外部世界的秩序。学校把他视为需要被纠正的学生。做律师的父亲不断地用理性判断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到底在哪里出现了偏差,竭尽所能地付出责任和爱,试图纠正儿子的行为偏差和心理偏差。祖父对孙子的脆弱嗤之以鼻,这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硬保守派,认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矫情病。

这个剧本最为冷静细腻的优点,是从一系列日常试探和交锋的情境中,暗暗指向一个让人感到无力的结论:青少年的抑郁不是法律官司,它没有清晰明确的因果逻辑可言,也没有对症下药的解救疗程。天性敏感,原生家庭破裂,母亲情绪不够稳定,父亲另组家庭,这些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尼古拉斯,但没有哪条明确地成为尼古拉斯的“病因”。事实上,尼古拉斯没有遭遇校园暴力,也没有受过家庭冷暴力,甚至,他是不缺爱的,他的双亲已经愿意付出大部分父、能和他平等地交流,也随时愿意付出无条件的支持和爱。但是在生命理性退场的黑暗角落,爱是无能为力的。尼古拉斯第一次自杀被救回时,他的主治医生沉痛地告诉他的父母:

你们儿子的意识世界是破碎的,仅仅靠亲人的爱并不能重建孩子的内心秩序。

《父亲》和《儿子》的原剧本,贯穿作品中所罕见的能量是不断走向个体内部的针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渲染了阿尔兹海默病人的主观视角,通过破碎的情境来正面强攻这个主题。然而对于《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他的混乱心绪成为言简意赅的隐喻,三次出现的洗衣机滚筒特写暗示了这一点。影片里更多的篇幅、更可见的部分交给了“儿子的父母”,从围绕着“被死亡捕获的孩子”转向侧重于“与悲剧和解的父母”,这和解包括:为人父母者承认自己的局限,有时,甚至要接受自己的无能,承认和接受亲密关系中不能幸免的失败,这些并不可耻。

这是成人视角下的自洽的自我疗愈,也是更安全的、大部分观众熟悉的叙事策略。譬如琳恩·拉姆塞导演的《凯文怎么了》,主角不是凯文而是他的母亲,她用半生去克服自责和被责难——生下反社会人格的病态孩子,不是母亲的罪过。夏维尔·多兰导演的《妈咪》,主角是筋疲力尽的单身母亲,她不应该为了照顾多动症的儿子而牺牲自己的生活,把患病的孩子送进精神病院,不是她的罪过。一次又一次,是“正常的成年人”伤痕累累地接受“可怕的孩子”制造的混

乱、灾难甚至死亡。

这一套世俗“正常”的情理逻辑,完美错开了此类题材的黑暗之心。《困在心绪里的儿子》有一个苦涩的结尾,在父亲的想象里,儿子被治愈,去另一个城市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并如愿实现了作家梦。休·杰克曼的表演无懈可击,可是这个父亲越是引发生情和认可,这电影的遗憾就越明显:直到最后,儿子一直是父亲视线下的儿子。名为“儿子”的电影,绝对的主体是父亲,儿子起初是他要矫正的对象,最后是他虚构的幻象。何况,父亲想象中的儿子“被治愈”,未尝不是另一种“被矫正”。从开始到结束,电影的重点不是困于疾病的儿子,而是困于儿子疾病的父母。

同样在大银幕上,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是镜头下的主体,他的“病患”体验是生命体验中平等的一种,它被承认是独特的、有哲学意味的,而不是不正常的、必须被治疗和克服的。为什么角色换成抑郁症的孩子,这个群体的主体性无法被承认而顾左右言父母?为什么他们晦涩的生命体验在银幕上终究是不可见的,他们若不被“治愈”就被定义为悲剧?对比《儿子》的原作和舞台剧,这是不是电影作为大众娱乐产品的保守和胆怯?是不是电影落后于文学和剧场的时间差呢?

本报讯(记者姜方)“演艺大世界—2023上海国际音乐节”昨天在上海文化广场启幕。记者获悉,这里的“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历经三年规划和建设正式启用,该中心致力于成为音乐剧的“实体孵化器”,填补国内原创服务平台的空白,共同点亮中国音乐剧希望之光。

“为打造这个集内容孵化、人才集聚、先锋实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空间’,未来,我们将汇聚业内伙伴的力量,携手有志参与其中的音乐剧人及爱好者,共同探索、开发这一领域的可能性,让它成为充满记忆和归属感的场域,筑就起音乐剧行业蓬勃的生态环境,为成立五年的上海演艺大世界注入新活力。”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浩说。

为了给创作者们提供更好的资源与平台,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的实体空间——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应运而生。历时三年调研规划与设计改造,明确以垂直、共享、社交为关键词,音乐剧中心将连接演出、制作、创作、经纪等产业链多个环节,为行业试行可复制、可持续的原创作品孵化体系,推动上海从“演艺码头”向“演艺源头”的转型。

这里将被打造成“音乐剧创制及爱好者之家”——在1500平方米的空间里,集合了创排空间、共享办公室、录音棚、资料室、采访室等,为每一位向往或正在从事音乐剧行业的追梦人提供一个能交流、有汇集的广场,一个鼓励先锋、生长力拔群的实验室,一个涵盖培训、咨询的补给站,一个拥有人才、版权的资源库,一个提供经纪、对接市场的连结点。目前,由比利时先锋剧团Ontroerend Goed创作的一对一治愈剧场“遇见自我”系列《一个人的游戏》《一个人的微笑》正在音乐剧中心上演,初步计划完成4个月2304场驻演演出,以颠覆式戏剧创作理念向业内外人士展示这一空间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和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支持下,5月底,在本届音乐节闭幕之际,上海文化广场计划举办首届“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节音乐剧风云榜”,集中展现中国音乐剧发展的最高水平和创作、表演实力,为音乐节五年历程进行阶段性总结和指数发布。

作为中国首个具有专业度和系统性的音乐节,“演艺大世界—2023上海国际音乐节”已举办至第五届,今年以“一季展演”“一届论坛”“一项计划”“一个活动”四大内容板块为多元面向,为邀长年致力于中国原创音乐剧创作的知名作曲家、音乐人三宝担任本届音乐节节推广形象大使。活动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音综首秀流行歌曲

突破唱法樊篱 “好听”跨越时光

■本报记者 姜方

“High C无压力”“这是来自‘国家队’的降维打击,声音直击灵魂”……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2》收官之夜中,歌唱家石倚洁一饱饱情感的《我期待》火速出圈,节目现场田震、孙悦、周深等一线歌手纷纷为之热烈鼓掌。这位上海男高音,继本月在沪出演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人》后,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身为普契尼歌剧的优秀男一号,石倚洁再次刷屏是因为首次在公开舞台上演唱流行歌曲。《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神采”,正如歌词所言,这首歌也是为了致敬他儿时的偶像歌手张雨生。而面对这首超高难度的歌曲《我期待》,他不仅跨越了唱法樊篱,从流行过渡到男高音,并充分展示了层次鲜明、饱满深情、极具厚度的专业演绎——主歌部分娓娓道来的细腻表达,让听者感受到跨越了时光的“好听”;而当“say——goodbye——”干净饱满、清澈明朗的高音响起时,感动了屏幕内外的嘉宾和网友。“流量靠边吧,音综就应该多请这些美声实力派。”弹幕上听众纷纷留言。

在歌声中见证时光,也用歌声不断迎接新的挑战,从小时候喜欢《我期待》,到真正在舞台上纵情演绎这首歌,石倚洁走过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我肯定唱不上去;后来学了唱歌,2010年的时候觉得可以稍微唱一点了;直到这次参加《时光音乐会》,实际上也是降调演唱的。”石倚洁告诉记者,《我期待》的原调高达High D,而这次节目中的演唱选择降了两个调,“最高音从High D降到了High C,也是选取了自己声部最舒服自如的状态,同时又可以较好地表现自己的声音”。

有网友说,石倚洁的歌声意外地“深情脉脉”,高音区尤其“直击心灵”。其实这背后正是专业美声歌唱演员转战流行唱法最难的地方——调整演唱习惯与方式。“美声唱久了之后,即使演唱流行歌也会有美声的痕迹,特别是演唱高音时,会情不自禁地用到一些美声的方法。但是美声由于追求在更大空间里传递人声,难免会产生和观众的隔离感,也难怪有人会觉得美声唱法‘板’。”因此,石倚洁特别注意,“前半段我彻底脱离了美声状态,而后半段我尝试尽量不要往美声靠拢,而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前后如何顺畅过渡与衔接,尽量消除两者的违和感。”

要知道,顶级歌者在不同的舞台演唱不同的内容,歌唱的方法可以完全不同。比如歌唱演员在演出歌剧时,一个人会面对多则两三千位观众,乐池里有六七十位乐手,庞大的人群组成厚重“人墙”,要求歌唱演员不仅要吧音量扩大到极致,让人声穿透“人墙”和乐声融合在一起传达给观众,还要展现出歌声的强弱和色彩对比。而当在演唱艺术歌曲时,观众人数会相对少一些,乐器则仅有钢琴,那么在用嗓方式上会更加柔和一点,更讲究艺术歌曲的意境和韵味。当在演唱流行歌曲时,因为有麦克风,无需声如洪钟而更在意的是要把演唱处理得更加细腻。

“美声歌手的演唱注重严格的方法与规则,在规则中追求完美,和流行唱法相比容易收到‘唱得很完美,但缺少个性’‘毫无瑕疵,全是技巧’的点评。对此,石倚洁表示,正是因为这些议论的存在,促使他逐步思考如何在保证专业的前提下,多进行一些尝试和突破。”希望借助《时光音乐会2》这样的综艺舞台,让更多观众感受到美声歌唱演员个性化的一面,也希望更多美声歌者的‘个人秀’能出圈,吸引更多观众不仅爱听演唱会,也能来到剧院,亲耳聆听音乐会、歌剧。”

这位享誉国际的男高音,正在积极尝试拓宽自身专业范畴的边界。就像表达了心声的《我期待》所唱,石倚洁昂首阔步,继续自己不留一丝遗憾的音乐之旅。